
September 2018

Retrospect and Re-exploration of Structuralism

Qichao Zhou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Zhou, Qichao. 2018. "Retrospect and Re-exploration of Structuralism."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8, (5): pp.26-33.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8/iss5/15>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结构主义文论回望与再探

周启超

摘要:“结构主义”之真正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的理论之旅,是当代文论与比较诗学研究的一个基本课题。在不少人心目中,“结构主义”是一种学派,一种思潮。罗兰·巴尔特却不以为然。在这位法国结构主义主将看来,结构主义是一种建构性活动。不少人认为,“结构主义”是一种理论,一种方法。扬·穆卡若夫斯基却不以为然。以这位捷克结构主义首领之见,结构主义是一种认识论立场。在我们看来,结构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建构性活动,也不仅仅是一种认识论立场,更是一种思想范式。结构主义文论参与了20世纪“诗学范式”的建构。正是“诗学范式”“阐释学范式”“现象学范式”“社会学范式”这四大范式彼此之间的对话与互动、对立与交锋,孕育了流派林立、学说纷呈的20世纪世界文论。看来,只有经由对结构主义文论这一思想范式的深度开采,才能直面原本就是多形态的结构主义文论,才能进入对结构主义文论的多面观,才能超越流行经年但确乎是被我们简化了的粗放式的“结构主义如是观”。

关键词: 结构主义; 范式; 理论旅行; 比较诗学; 再探

作者简介: 周启超,博士,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现代斯拉夫文论研究。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浙江大学西溪校区人文学院中文系58信箱,邮政编码:310028。电子邮箱:zhouqichao88@126.com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现代斯拉夫文论经典汉译与大家名说研究”[项目编号:17ZDA282]中期成果。

Title: Retrospect and Re-exploration of Structuralism

Abstract: The cross-disciplinary and multi-lingual theoretical journey of “structuralism” is one of the essential topic in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comparative poetics. Is “structuralism” a school or ideological trend? Roland Barthes argues that structuralism is neither a school nor a movement but an activity. Is “structuralism” a theory or a methodology? Structuralist Jan Mykarovsky believes that structuralism is neither a theory nor a methodology but a cognitive position independent from both. Structuralism de facto is not only a construction activity but a cognitive position and even an ideological paradigm. It is the structuralist criticism belonging to dialogue and interactivity, contrast and conflict between “poetic paradigm” and “hermeneutic paradigm”, “phenomenological paradigm” and “sociological paradigm” that promotes prosperity of 20th century’s world literary criticism. We can face the diversified forms of structuralist criticism only through the in-depth exploration of its ideological paradigm thus entering into the multifaceted structuralist criticism and transcending the perpetually popular but being simplified “structuralism”.

Key words: structuralism paradigm; theoretical journey; comparative poetics; retrospect

Author: Zhou Qichao, Ph. D., is a professor of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interests cover modern Slavic literary criticism. Address: Chinese Dept. 58,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XiXi Campus of Zhejiang University, 148 Tianmushan Road, Hangzhou, 310028, China. Email: zhouqichao88@126.com This article is the mid-term achievement the Key Project of National Fund of Social Sciences (No. 17ZDA282).

—

20世纪被人们称为“批评的世纪”。在这个众声喧哗的“批评的世纪”，世界文论的舞台上“主义”纷呈，流派林立。经过漫漫几十年的发展演变，结构主义之真正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的理论旅行，别的“主义”实难以与之比肩。即便是告别了“结构主义”的“后结构主义”，也是以对“结构主义”的反思、反叛、扬弃为起点。我们已经看到，学界在梳理在绘制“结构主义”的发育谱系、发展版图而书写《结构主义史》；我们即将看到，学界在清理在考察“结构主义”的理念、概念、术语、话语、流派、阵地而编撰《结构主义百科全书》。国际文论界的最新动态表明，即便是在“后结构主义”之后的新世纪，“结构主义”之真正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的理论旅行，依然是当代文论与比较诗学研究的一个基本论题。近年来在英国谢菲尔德大学(2015年)、意大利米兰大学(2015年)、中国广州外语外贸大学(2016年)、捷克科学院(2018年)相继举办的几个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结构主义”均被纳入大会议题。今年7月在布拉格举行的“中欧文学理论的世界影响”国际学术研讨会，其主题就是“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与现象学”的理论旅行。看来，“结构主义”并不像有些人以为的那样在现如今已经是一个有些陈旧的话题，而是一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若明若暗的“主义”，一个需要给予冷静的历史回溯与多维的理论反思的“主义”，一个需要回望、有待再探也有可能深度开采而得以重构的“主义”。

“结构主义”究竟是什么？

这是一种学派。这是一种思潮。这是批评界不少学者所认同的结构主义如是观。

然而，曾经是法国结构主义主将的罗兰·巴尔特对这一定位却不以为然。在巴尔特看来，结构主义并不是一个学派，也不是一个运动，而是一种活动。巴尔特196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的题目就是“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活动”。

这样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必须说结构主义活动：创作或思考在此处并不是重现世界的“印象”(impression)，而是真的制作一个世界，它与原来的世界很

相似，不是为了复制，而是为了使它可以理解。因此人们可以说结构主义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摹仿活动，这也就是为什么，严格地说，在知识的结构主义和文学或一般的艺术之间并没有任何技术上的差别：它们两者都是摹仿，不是在内容上的模拟(就像在现实主义艺术中所做的)，而是在功能上的模拟(列维-施特劳斯称之为同形[homologie])。当特鲁别茨柯依(Troubetskoy)把语音客体作为语言变化系统建立起来的时候，当普罗普通过将他事先拆解的斯拉夫民间故事的结构化而建构起一个民间故事时，当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发现图腾的想象形象有同形的功能时，当J.-P.里夏尔(Richard)把马拉美的一首诗分为特征明显的震颤节奏时，[……]这是把一些成分以及这些成分连接起来，加以调整形成的表达。[……]于是与分析模式或创作模式之间的关系就决定了结构主义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人们重建客体是为了呈现功能，可以说，是路径造就作品；这就是为什么应当说结构主义活动，而不是结构主义作品。(200—201)^①

结构主义究竟是什么？

这是一种理论。这是一种方法。这是文论界不少学者所建构的结构主义如是观。

然而，曾经是布拉格结构主义首领的扬·穆卡若夫斯基对这一定位却不以为然。以穆卡若夫斯基之见，结构主义不是“理论”：“理论”通常是作为固定的知识体系而呈现的；结构主义也不是“方法”：方法一般被视为同一化的运作机制。结构主义是一种“认识论立场”：它既独立于“理论”又独立于“方法”。1940年，穆卡若夫斯基在《美学与文学学中的结构主义》一文里强调：

源自科学与哲学持续的相互联系，并在这种联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科学观点，即结构主义。我们讲“观点”，是为回避“理论”或“方法”这些术语。“理论”意指稳固的知识集合，“方法”同样意味着工作准则完整且不容更改的集

合。结构主义既非前者,也非后者——它是一种认识论立场,从中自然会得出某种工作准则乃至某种认识。(184)

[……]作为意义的统一体,结构比单纯叠加的整体要大得多,这类整体是由各部分简单相加所产生的。结构的整体包含自身的每一个部分,与此相反,这每一个部分刚好符合这一整体,而非其他整体。结构的另一个本质属性是它的能量特征和动态特征。结构的能量性在于,每一个单一要素在共同统一体中都具有一定功能,这一功能使要素位列结构的整体当中,将其捆绑到整体之上;结构整体的动态性则为,这些单一功能及其相互关系,由于持续的变化,构成自身能量特性的基础。作为整体的结构处于持续的运动之中,因此区别于因变化而遭到破坏的叠加的整体。(185)

在此,结构主义的主要原则以最简要的概述被勾勒出来,它不是个人的“发明”,而是现代科学史发展的必然阶段。[……]然而今日已经可以在心理学、语言学、普遍美学,乃至不相关联的艺术理论和艺术史中,在人种学(民族学)、地理学、社会学、生物学,可能还有另外其他的学科中,谈到结构主义了。(186)

在对作为一种“认识论立场”的结构主义作出这番界说之后,穆卡若夫斯基重点论述两门学科——美学和文学学——的“结构主义”理念。

[……]在单一艺术样式的整体理论集合中,文学是迄今为止在结构的意义上处理得最为系统的学科;也是在文学中,符号和意义的问题体现得最为显著,这对结构主义美学来说具有至为根本的重要性。艺术材料的问题对于结构主义文学理论具有独特的关联性,艺术材料在诗歌中为语言,主要来自由人创造的人的符号系统,它建构在作为社会产物的人和整个自然及文化的关系之上。(《美学与文学学中的结构主义》195)

这一表述,不仅是布拉格学派对“结构主义”理念的一种概括,更是对结构主义文学研究实践与美学研究实践的一种总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著名斯拉夫文论专家彼得·斯坦纳对“结构主义”理论框架进行“最小还原”,聚焦结构主义话语体系中的三大轴心概念:结构、功能、符号。

结构、功能、符号这三者是相互关联的。最为复杂的就是“结构”。结构主义话语体系中的“结构”,不仅仅是在指称具体的物质物体物象之整体“组织”,而且也是在指称作为社会共享“符号”的一套“建制”。不论是其创作还是其接受都被这套建制所涵纳所统摄的单部文艺作品便是这种“符号”,因而是一种结构;同理,构成既定群体文化的各种符号的完整统一体也是一种“结构”——“结构的结构”。结构主义话语体系中第二个轴心概念则是“功能”。“功能”被“布拉格语言学小组”看作为对结构进行区分加以评价的一个标准。对于“结构”所具“功能”的推重,对于在系统中被“突显”的“主导功能”的推重,使得“功能”成为“布拉格结构主义”的一个独特标记。从功能上来看,作为“结构”的符号在规范着特定功能的履行。譬如说,单部文艺作品便是作为“结构”的符号之具体呈现;文艺作品这种符号的“结构”组织,便体现着作为社会共享符号而被艺术地呈现的那套现实社会建制的结构关系。单部文艺作品的构成元素均服从于其“主导功能”。单部文艺作品不仅仅履行自己的功能,也表征这些功能。结构主义话语体系中第三个轴心概念便是“符号”。符号是物质手段与非物质意义的结合。符号在不同的系统中改写结构的双重特性:它的情感、社会共享的存在以及它在单部文艺作品中的具体体现。文化是以符号间复杂的交互作用而履行其社会功能的。文艺作品是一种符号性存在。文学作品的创作与接受便是作为结构的符号在履行其文化功能的一种建构活动(斯坦纳 13)。

曾经是法国结构主义主将的罗兰·巴尔特与曾经是捷克结构主义首领的扬·穆卡若夫斯基当年“从内部”对“结构主义”的这番界说,不应被忘却。其实,结构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建构性活动”,也不仅仅是一种“认识论立场”,结构主义更是一种思想范式。

在当代俄罗斯学界新近推出的一部文学理论教科书里,“结构主义”已被列入 20 世纪世界文

论的四大范式之一——“诗学范式”。文学学中的“结构主义”——对神话的结构分析、对叙事的结构分析、对话语的结构分析——在这里被定位为对诗学之新的回归。结构主义文论参与了 20 世纪“诗学范式”的建构。正是“诗学范式”“阐释学范式”“现象学范式”“社会学范式”彼此之间的对话与互动,对立与交锋,孕育生成了整个 20 世纪世界文论的学派林立、学说纷呈、学人辈出。^②

可见,对结构主义文论是可以也应该作多面观的。

二

之所以提出应该对结构主义文论作多面观,是鉴于我们对原本就是多形态的结构主义文论的了解还是若明若暗的。

可以说,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降,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当代中国学界已渐渐熟悉的结构主义,主要的还是索绪尔这一脉;这四十年来得我们比较充分的译介的结构主义文论,主要的还是来自法国的这一支。譬如,列维-施特劳斯的《神话结构》与布雷蒙的《叙事潜能之逻辑》被我们引介;格雷马斯的《结构语义学》与热奈特的《叙述话语》被我们翻译;巴尔特的《叙事文本结构分析引论》《符号学要素》与托多罗夫的《诗学》《文学概念》被当代中国学界所征用;陆续登陆中国,进入当代中国学人视野的,还有“巴黎符号学派”,还有拉康的精神分析,还有阿尔都塞、戈德曼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我们看到,正是得力于结构主义的引领,符号学文论、叙事学文论在当代法国十分盛行。

可以说,当代中国学界对苏联结构主义文论也并不陌生。我们先是从英译本、法译本,后来从俄文原著接受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洛特曼的《诗文本》《艺术文本的结构》、乌斯宾斯基的《结构诗学》、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的《苏联符号学概论》以及米哈依尔·加斯帕罗夫那些精彩的诗文本结构分析理论与实践;我们看到,“莫斯科-塔尔图学派”基于结构主义理论的滋养而在文学符号学、艺术符号学、文化符号学领域取得十分卓越的理论建树,为苏联文论平添了令人瞩目的奇光异彩。

然而,当代中国学界对捷克结构主义文论知

之甚少。我们最初是通过美国学者韦勒克的著述才知晓扬·穆卡若夫斯基的名字;罗曼·雅各布森在大多数中国学者心目中主要是一位语言学家,或俄罗斯形式主义核心话语之一“文学性”命题的提出者。对尼古拉·特鲁别茨柯依、菲尼克斯·沃迪奇卡等“布拉格学派”重要成员的理论建树,我们更是少有引介。我们没有一部中文版《布拉格文论选》,甚至没有一部中文版《穆卡若夫斯基文论选》。读者可以看到的穆卡若夫斯基几篇论文的汉译,或是自俄文转译(《什克洛夫斯基〈散文论〉捷译本序言》和《艺术的意向性和非意向性》),或是自英文转译(《标准语言与诗歌语言》甚至是节译),自捷克文原著直译的很少(《现代艺术中的辩证矛盾》和《对话与独白》)。我们对“布拉格学派”文论的价值认识很不到位,对结构主义文论发展史的了解失之于简单化。不少学者只知道法国结构主义。某些文学理论教科书上甚至将在“布拉格学派”归置于俄罗斯形式主义。

事实上,正是“布拉格学派”首倡“结构主义”。聚焦于“作为符号而具有功能的结构”是“布拉格学派”根本的学术旨趣。正是“布拉格学派”最早发现:文艺作品是一种符号性存在,是对作为社会建制而被社会群体所共享的文化符号的审美体现;文艺作品具有多种文化功能,审美功能是其主导功能而不是其唯一功能。“布拉格学派”的理论拓展力甚强,探索领域甚为宽广;基于哲学的支撑,这个学派积极地将诗学延伸至美学,由文学学扩展到艺术学,从勘察言语艺术这一符号的“结构”拓展到探析所有艺术符号以及艺术之外的符号的“结构”。

“布拉格学派”以其丰富多彩的话语实践与丰厚多产的理论建树而成为“结构主义”的一大重要支脉,一个独特形态。

之所以提出应该对结构主义文论作多面观,还基于国际学界对结构主义文论的回望与再探已然以多路径在展开。

对结构主义发育谱系与发展版图进行深度梳理,将使我们看到结构主义这一“建构性活动”这一“认识论立场”这一“思想范式”内部也有不同的“结构”。或者说,可以从思想史上来勘探与清理结构主义发育发展的不同模式。例如,瑞士学者帕特里克·弗莱克已经在关注“结构主义”谱系绘制上的“法国模式”与“中东欧模式”。

“结构主义”谱系绘制上的“法国模式”可谓国际学界流行多年的一种模式。费尔迪南·德·索绪尔和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的著作,在这一模式里得到极度重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巴黎结构主义在这一模式里被视为结构主义最繁荣也是最重要的时期;罗兰·巴尔特、热拉尔·热奈特、茨维坦·托多罗夫等在这里被尊为结构主义大师。索绪尔在这一模式里被奉为结构主义创始人,似乎是索绪尔凭一己之力,为语言学和符号学开创出新纪元。列维-施特劳斯在结构主义发展史上的关键作用是将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应用于其他领域,开启了1960年代“结构主义范式”由语言符号研究向其他人文学科大举拓展的时代。

与“法国模式”形成对话或挑战的则是“结构主义”谱系绘制上的“中东欧模式或斯拉夫模式”。这一模式主张尊重结构主义发育发展的原生态,积极还原努力重构多形态多学派的结构主义。这一模式重视中东欧结构主义或“斯拉夫结构主义”思想起源和学术旨趣的独立性,重视中东欧结构主义或“斯拉夫结构主义”在核心理念上的独创性,重视“中东欧结构主义”或“斯拉夫结构主义”与“索绪尔式结构主义”不同的探索路径。应该看到,布拉格学派理论建树不仅仅是在音位学上取得的成就(雅各布森和特鲁别茨科伊);布拉格学派在结构主义之跨学科的实践上更有开拓之功。布拉格学派的研究领域涵盖美学、符号学,文学理论、戏剧研究;布拉格学派的发育就是理论跨文化旅行的一个典型标本。索绪尔并不是布拉格学派直接和唯一的思想来源;当年对布拉格学派理念的形成发生了深刻影响的,还有波兰语言学家博杜恩·德·库尔德内,更有彼得堡“诗语研究会”与“莫斯科语言学小组”里或从文学学切入语言或从语言学切入文学的那些“形式主义者”:尤里·蒂尼亚诺夫、列夫·雅库宾斯基、叶甫盖尼·波里万诺夫、格里戈利·维诺库尔。与俄罗斯形式论学派有别,布拉格学派的思想来源更为丰富,有语言学、语文学、文学学的滋养,更有艺术学、美学、哲学的支撑,尤其是受惠于埃德蒙德·胡塞尔以及胡塞尔的俄罗斯弟子古斯塔夫·什佩特的现象学。比较深入的学说史梳理与思想史清理已经表明,“结构”“系统”“功能”这些理念与概念其实并不是在布拉格学派才出现的。有学者已经发现,在新洪堡主义语言学

和心理学(譬如,海曼·施泰因塔尔、亚历山大·波捷布尼亚)的著述里,在宣扬欧亚主义保守意识形态(譬如,彼得·萨文斯基)的著述里,在19世纪斯拉夫哲学家(譬如,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的著述里,都可以看到“结构”“系统”“功能”这样一些表述。在语言学发展史上,“结构”和“系统”这两个概念并非与新语法主义决裂后骤然出现,而是在与其他思想漫长的冲突斗争中逐渐出现,凝结成形;在哲学史上,“结构”和“系统”则是在同德国有机论(歌德)、德国唯心主义哲学(黑格尔)、德国自然哲学所推崇的一系列概念的斗争中发育成长(弗莱克20)。已有学者看出,雅各布森“文学性”命题的表述本身就具有现象学意味。2018年7月在布拉格举行的主题为“中欧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与现象学的理论旅行”的国际研讨会上,我们了解到布拉格学者们已组织编写一部结构主义史与一部结构主义百科全书。布拉格学者告诉我们,这两部著作将充分地展示这另一种“结构主义如是观”:结构主义不再仅仅被看作是一种线性运动的思潮;对结构主义历史的描述不再以索绪尔的结构主义为主线。流行多年的那种以巴黎学派为中心,布拉格学派不过是结构主义的前奏之类的成见,已经受到挑战。

应该看到,国际学界对结构主义发育谱系的勘探正在向纵深推进,对结构主义发展版图的绘制正在不断更新。一些忠诚于结构主义的学者已然进入多形态的结构主义的发育与发展之多路径的梳理细察。

那么,在对结构主义之多路径的回望与再探之中,学者们又是如何面对多形态的结构主义文论中不同的学派集群之间的关联与交集呢?结构主义的“巴黎学派”与“布拉格学派”,或者“布拉格学派”与“塔尔图学派”之间又有怎样的关联呢?或者说,“斯拉夫结构主义”同“索绪尔式结构主义”有没有发生什么交集呢?

“雅各布森模式”似乎在回应这个问题。雅各布森被誉为“结构主义领航员”。作为“莫斯科语言学小组”“布拉格语言学小组”“哥本哈根语言学小组”“纽约语言学小组”的组建者之一,作为语言学家、符号学家、文学理论家的雅各布森,在促成结构主义不同支脉不同形态之间的互动与交融上做出了十分卓越的贡献。结构主义思想的发育与发展涉及众多学人与学说,构成了学人学

说学派互动与交集的关系网。雅各布森以其跨学科的探索与跨文化的实践,恰恰成为结构主义发育谱系与发展版图上一个“核心结点”。自1926年起,雅各布森自中欧、北欧至美国由东往西不断地推进结构主义;自1956年起,雅各布森又由西向东不懈地传播结构主义,积极促进法国、意大利、以色列、东德、波兰、苏联的“结构主义”。雅各布森一生的学术探索,堪称结构主义跨文化旅行的一个缩影。雅各布森既是一位卓越的语言学家,又是一位杰出的诗学家。他一生致力于“声音与意义”之关联与接合机制的探讨。他在语言学领域创建的“音位理论”“六功能说”“对等原则”“隐喻与换喻理论”成为也可以拓展到文学学、艺术学、符号学、人类学、精神分析学等不同学科中的模型或范式。如此成功地跨界的雅各布森又确乎是结构主义跨学科之旅的一个典型。与结构主义有关的众多流派的思想学说在雅各布森这个“结点”集结。若对雅各布森这位“结构主义领航员”之跨学科的探索与跨文化的实践进行深度梳理,自然就会清理雅各布森与那些结构主义的发育发展有交集的语言学史、哲学史、符号学史上的重要学人——譬如,索绪尔、胡塞尔、列维·施特劳斯、拉康、埃科、洛特曼、巴赫金、赵元任——的互动关系。有趣的是,新近已有学者考察出雅各布森的结构主义思想之源还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的德国。瑞士学者帕特里克·弗莱克认为,“只有意识到像雅各布森这样的结构主义大家确实同19世纪德国思想有着紧密关联,[……]才能更细致入微地描绘出结构主义这一范式发育发展的图谱。结构主义思想其实是经过了漫长的变化,从19世纪德国思想之中脱胎而出的”(22)。

可见,若不再仅仅将结构主义看作是一种线性运动的思潮,不再只作现象层面的描述,而是将结构主义看成是一种范式,进入学理层面的勘探,就会看到结构主义其实是多支脉多形态的,而不能将之简化为索绪尔式结构主义这一种;结构主义思想的发育也是多源头多路径的,其生成之路漫长而悠久。

三

这样一种对多形态的结构主义发育谱系发展路径的回望与再探,也不仅仅是结构主义学术史

研究的一个话题。它会在思想史意义上修正我们对结构主义的现有认知。对多形态的结构主义的深度勘探,会更新我们心目中的结构主义的形象:结构主义并不是仅仅行进在在“索绪尔——施特劳斯”这样的单行道上;也并不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方才繁荣而是在这之前就有颇多建树;结构主义的思想源头并不仅仅是语言学这一个学科,而是更有语言学之外的诸多学科(语文学、哲学、心理学等)。而且,结构主义的探索也没有局限于语言学与文学学这两个学科。事实上,结构主义作为跨越多个学科的话语实践,早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就由布拉格学派成功地实现了。

应该强调,将布拉格称为“结构主义”的第一个驿站,这一表述的内涵应当是相当丰富的,而不应当被简化。“第一驿站”在这里不应当仅仅被解读为一个“前奏”而已。事实上,“结构主义”这个术语之首次被提出,“结构主义”这个概念之首次被表述,作为学术史与思想史上的一个事件,正是发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发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布拉格。

回望结构主义的发育发展历程,理应正本清源,理应追溯“结构主义”究竟何时何地诞生。我们发现,1929年刊发在捷克的周报《功勋》上的一篇短文,竟是“结构主义”首次亮相的记录,竟是“结构主义”第一次发声的见证。从学术史的意义上来清理,“结构主义”这个词语,这个表述,首次见诸于报端,最早出现在《浪漫主义的泛斯拉夫主义——新斯拉夫学》一文里。该文其实是对刚刚在布拉格举行的“第一届斯拉夫语文学家代表大会”^⑤的一篇报道,或者说,一篇会议侧记。正是在这里,青年雅各布森充满激情地宣示:

如果我们意欲对拥有其极为不同的表现的今日科学之主导性的思想加以简练的界说,我们找不到一个比结构主义更为合适的指称。当代科学正对之加以研究的每一个现象簇,不是作为机械的堆积物,而是作为结构的整体,作为系统在被考察被勘探,而且主要的任务——在于揭示这现象簇的内在规律,静态的规律与发育的规律。不是外在的动机,而是发育之内在的前提,不是对其机械的理解中的起源,而是功能——处于今

日科学兴趣的中心。正因为如此,可以理解,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的那些争论中,人们是如此频繁地讨论结构主义的语言学,谈论内在的文学学;同样,在这次代表大会全体会议的决议中出现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那一段文字,也绝非偶然。^④

可见,“结构主义”是在布拉格学派(“布拉格语言学小组”)的摇篮里孕育的。可以说,1926年10月,“布拉格语言学小组”的建立,标志着“结构主义”的孳生。耐人寻味的是,整整60年之后,1966年10月,在美国,在巴尔的摩,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人文中心举办的那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雅克·德里达以《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游戏》这一报告率先对结构主义发难,巴黎的结构主义自此从如日中升的佳境中渐渐式微。

1926年与1966年可以被视为结构主义思想史上的两个节点。

2016年在结构主义思想史也是不寻常的年份。这一年是“结构主义”遭遇“解构”而进入“后结构主义”之第50个年头。这恰恰是回望结构主义再探结构主义的一个契机。国际学界在2016年举行了对“结构主义”的多种纪念。

2016年似乎也成为“结构主义”的一个祭年。就在这年春天,翁伯特·埃科,在米兰会议上给我们做了追思雅各布森的报告后,仅仅过了三个月,这位当代意大利著名符号学家、美学家、哲学家、文学批评家、小说家就驾鹤西去;自埃科之后,茨维坦·托多罗夫,当代法国著名文论家、“叙述学”这一术语的发明者、俄罗斯形式学派文论与巴赫金文论在法国最早的推介者,于2017年春悄然谢世;自托多罗夫之后,热奈尔·热奈特,这位法国结构主义最忠诚最执著的诗学理论大家,当代叙述学的一代宗师,也于2018年春告别人世。埃科、托多罗夫、热奈特一个接一个相继离世,就更引发我们来追思结构主义,来回望结构主义,来再探结构主义文论的版图与谱系。

积极关注结构主义文论回望与再探中的最新成果,有助于我们超越被简化的结构主义如是观,从而放弃将结构主义文论仅仅看成是已然远去的一种思潮这一成见。充分认识到结构主义文论本来就是多形态的,就有理据去勘探结构主义这一思想范式发育的原点与发展的原生态,去细察结构

主义文论本身“结构”上的多元与路向上的丰厚。

检阅一下国外学界对结构主义文论的回望态势与再探成果,反思一下当代中国对结构主义文论的译介与借鉴历程与路径,就不难发现,我们对多形态的结构主义文论的引介与研究,尚有很大空间;在对多形态的结构主义文论的开采与借鉴上,其实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结构主义文论这一板块尚有待我们坚持不懈扎扎实实地“拿来”。尤其要大力推进“斯拉夫结构主义”文论的系统译介与大家学说的专题研究。譬如,布拉格学派文论汉译与研究,雅各布森文论汉译与研究。

扬·穆卡若夫斯基作为布拉格学派的首领,著有《捷克诗学论文集》(三卷本,1941年,1948年;捷克文),《诗学与美学之路》(1971年,捷克文),《扬·穆卡若夫斯基:诗学研究》(1982年,捷克学者编);美国学者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编选并翻译两卷本穆卡若夫斯基文选:《语词与语言艺术》(1977年)与《结构·符号·功能》(1978年);20世纪六十年代俄罗斯学者据洛特曼倡议已编选翻译两卷本穆卡若夫斯基文选,及至90年代终于出版《美学与艺术理论研究》(1994年)与《结构诗学研究》(1996年);在接受美学的发源地,德国学者编选翻译的穆卡若夫斯基文选至少有3部:《诗学文集》(1967年);《美学文集》(1970年);《结构主义美学与诗学研究》(1974年);如今,中国学界也应据捷克文原著编选一部《扬·穆卡若夫斯基文论选》,将《标准语与诗语》(1932年)、《作为符号学事实的艺术》(1934年)、《作为社会事实的美学功能、规范与价值》(1936年)、《美学与文学学中的结构主义》(1940年)、《审美功能在其他功能中的地位》(1944年)这样的名篇完整地译成汉语。在编选翻译《穆卡若夫斯基文论选》基础上,才可以进入结构主义第一驿站——布拉格学派历史风貌的勘探。

罗曼·雅各布森一生曾以俄文、捷克文、英文、法文、德文写出不少饮誉世界的文论名篇,已有《雅各布森选集》11卷本遗世。美国、俄罗斯、德国、法国,瑞典、瑞士、捷克等国学者均编选翻译了多种雅各布森文选。法国学界在雅各布森生前,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翻译出版了雅各布森语言学文选、诗学文选。雅各布森著作法译本自1963年起至少已有6种;1982年雅各布森在波士顿去世后,美国学界陆续推出多种英文版雅各布

森文选;雅各布森著作俄译本自1985年起至少也有6种;《雅各布森诗学文选》《雅各布森符号学文选》德译本也早就问世了。如今,我们中国学界也应精选一部《雅各布森文论选》。例如,首次提出“文学性”命题的《最新俄罗斯诗歌》(1919年),首次提出“结构主义”概念的《浪漫主义的泛斯拉夫主义——新斯拉夫学》(1929年),关涉隐喻与换喻理论的《语言的两个方面与失语症的两个类型》(1954年)、《何谓诗?》(1934年)、《主导》(1935年)、《语言学与诗学》(1958年)、《语法的诗与诗的语法》(1960年)、《诗学问题》(1973年)这样的名篇。这些名篇中一些文章的汉译大多是节译、选译、转译,如今均应据雅各布森文章初版所用的语种且完整地将它们译成中文。在编选翻译《雅各布森文论选》的基础上,才可以进入雅各布森语言学诗学与符号学文论的考察,进入这位“结构主义领航员”在文学理论领域独特建树的梳理,进而深入了解多形态的结构主义当中与索绪尔有关联有交集更有对话有差异的“这一个”大师的探索路径与学术旨趣。

看来,只有基于对结构主义文论经典的精选精译与研究上的深耕细作,只有经由对结构主义文论这一思想范式的深度开采,才能直面原本就是多形态的结构主义文论;及时关注国际学界结构主义回望与再探中的最新成果,努力进入对结构主义文论的多面观,则会有助于超越流行经年但确乎被我们简化的粗放式的“结构主义如是观”,从而更新我们对结构主义的认知,推进我们对结构主义的借鉴。

注释[Notes]

- ① 罗兰·巴尔特:《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活动》(“L'activité structuraliste”)该文的汉译有几个版本。这里采用钱翰博士应我们特约,据法文原著的新译。
- ② Turesheva, O. *Foreign Literary Theory and Methodology*. Moscow: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 2013. p. 20;此处的引文系本文作者所译。
- ③ “第一届斯拉夫语文学家代表大会”,1929年10月6日—13日在布拉格举行。
- ④ 原文为捷克文 *Romantické všeslovanství-nová slavistika*, *Čin.* 1: 1, 1929, pp. 10-12., 初刊于捷克周报《功勋》1929年10月31日。结构主义学术史上这一重要文献,在英、法、俄、德、汉语学界里一直没有全译。应我们特约,美国著名斯拉夫文论专家彼得·斯坦纳(Peter Steiner)教授2016年10月在布拉格找到这份周报,将该文译成俄文《浪漫主义的泛斯拉夫主义——新斯拉夫学》

(“Романтический панславизм — новая славистика”),笔者已将斯坦纳教授的俄译全文译为中文。参见《中国比较文学》3(2017): 5—7。之前,我国学界对雅各布森当年有关“结构主义”这一首次界说之征引,采用的都不是1929年的这篇原始文献,而只是雅各布森后来的转述。雅各布森在其《选集》第二卷卷末“回顾”(Restrospect)的开头,用英文对1929年这篇文献的核心段落进行了转述。参见 Jakobson R. *Restrospect//Selected Writings, Vol. II, Word and Language*. The Hague. Paris: Mouton, 1971. p. 712.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罗兰·巴尔特:“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活动”,钱翰译,《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第4辑,周启超主编。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年。199—204。
- [Barthes, Roland. “The Structural Activity.” Trans. Qian Han. *Foreign Literary Theory and Comparative Poetics* Vol. 4. Ed. Zhou Qichao. Beij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Press, 2017. 199-204.]
- 帕特里克·弗莱克:“雅各布森和德国思想向结构主义范式的转变”,杨建国译,《中国比较文学》3(2017): 16—23。
- [Flack, Patrick. “Roman Jakobson and the Transition of German Thought to the Structuralist Paradigm.” Trans. Yang Jianguo.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3 (2017): 16-23.]
- 罗曼·雅各布森:“浪漫主义的泛斯拉夫主义——新斯拉夫学”,周启超译,《中国比较文学》3(2017): 5—7;
- [Jakobson, Roman. “Romantism of Pan-Slavism: New Slavic Studies.” Trans. Zhou Qichao.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3(2017): 5-7]
- 扬·穆卡若夫斯基:“美学与文学学科中的结构主义”,杜常婧译,《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第4辑,周启超主编。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年。183—98。
- [Mukarovsky, Jan. “Aesthetics and Stucturalism in Literature”, Trans. Du Changjing. *Foreign Literary Theory and Comparative Poetics* Vol. 4. Ed. Zhou Qichao. Beij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Press, 2017. 183-98]
- 彼得·斯坦纳:“结构主义:从布拉格走向世界”,陈涛译,《中国比较文学》3(2017): 8—15。
- [Steiner, Peter. “Structuralism: from Prague to Everywhere.” Trans. Chen Tao.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3 (2017): 8-15.]
- 奥丽加·图雷舍娃:《国外文学学的理论与方法论》第2版。莫斯科:科学出版社,2013年。120—31。
- [Turesheva, O. *Foreign Literary Theory and Methodology*. Moscow: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 2013. 120-31.]

(责任编辑:王嘉军)